

王金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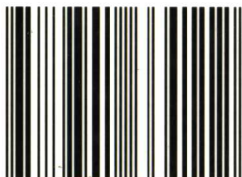
王金玉

档案学论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ISBN 7-80166-411-6



9 787801 664112 >

ISBN 7-80166-411-6/G · 119

定价：25.00 元

王金玉档案学论著

王金玉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金玉档案学论著/王金玉著.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4. 4

ISBN 7-80166-411-6

I. 王... I. 王... II. 档案学—文集
N. G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026 号

WANGJINYU DANGANXUE LUNZHU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850×1168 1/32 印张/12.875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定价/25.00 元

序

2003年2月底,王金玉的女儿王薇薇来到我办公室,请我为她爸爸的文稿《档案学论著》作序。她说,出版这本书和请我作序都是爸爸的遗愿。顿时,我感慨万千,王金玉先生似乎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2002年4月下旬,我去郑州大学讲学,王金玉先生到车站接我,听我讲课,陪我参观学校图书馆。我们谈起了档案古代史的研究问题,谈得很投机,并设想了一个研究计划。没想到三个月后,薇薇给我打电话,说她的父亲突然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在学术上,尤其是在档案史研究上很有成就,很有追求的学者,在事业需要他的时候离去。薇薇在电话里哭泣。我为失去一位好友、一位学者而感到悲痛。这是档案学术研究上的一个损失。

王金玉先生1938年12月出生在河南睢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964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1986年,他转业教档案史,虽然有些生疏,但十分投入,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并不断取得成果。他带领学生深钻古籍,发现档案史上的“千丈架阁”是宋仁宗时江南西路转运史周湛创造的管理簿籍案牍用的

“千文架阁”纠正了流传 800 年的历史错误；他溯源“档案”一词，把其最早在古籍上出现的时间，往前推移了 60 年；他撰写《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开创了我国档案史朝代专史的先河；他还在研究……。然而，壮志未酬，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亲人把他过去发表过的档案学术论文整理成书，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72 篇文章，分为九个专题，30 多万字，沉甸甸的。这是他 16 年的研究成果，是对档案学、特别是档案史的丰富和发展。

书的开篇《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指出当前忽视档案史研究，低估中国古代档案工作水平，偏离研究对象，缺乏争鸣气氛等现象，提出改变现状，求真务实地深入探索“档案”词源，研究古代档案官职、档案馆史、档案法规、档案管理以及档案学思想等建设性意见。这也是给他自己定下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课题。他正是这么做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他的研究成果外，他对古代档案库——从周代的天府，汉代的石渠阁、天禄阁，北宋的金耀门文书库，南宋的《京城图》上的架阁库，到元、明、清朝档案库的研究都有建树，还列有清代各省、县 182 座档案库的一览表。他对古代档案官职的研究以宋朝的为主，周、汉时期也有涉及。

书的最后一篇是《谈教学与创新——从事档案学教育十五年回顾》。这是他接到退休通知后，为自己写的档案学教学与研究的小结，也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是我生命之所在”的耿耿忠心 and 不懈的追

求。它的教学和科研成就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牢记“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他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要对学生负责，对事业负责，绝不能做一个滥竽充数的教师。”

他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他说：“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面对不足和困惑，只有恭恭敬敬地学，向同事学，向书本学。他勤跑图书馆、档案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等都去过，有的经常去。

他“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他说：“档案史研究的目标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之外，“最重要的是挖掘史料，做好史料的搜集工作”，当然，可以借鉴史学、考古、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甚至直接利用其成果，但研究档案史的第一手材料靠自己去挖掘，“如果浅尝辄止，耐不得寂寞，那就搞不成学问。”

王金玉先生视学术研究为生命，而且锲而不舍、严谨治学。他的这种精神和他的档案学术研究成果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感谢他的亲人整理出版这本书。这是对王金玉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是对读者的一份最好奉献。

刘国能

2003年4月初于北京

目 录

序	(1)
---------	-----

一、总论

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	(1)
浅论政治制度对档案工作的影响	(9)
档案与历史研究	(17)
学术研究可走内外接轨之路	(22)
档案在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地位	(25)
档案起源与文明起源	(31)

二、“档案”词源

“档案”名义探源	(38)
明初已有“文档”一词	(53)
“档案”词源新证	(57)

三、“千文架阁法”研究

“千文架阁法”非“千丈架阁法”	(61)
“千文架阁法”再探	(64)
宋代档案管理中的分类编排	(69)
“千文架阁法”的创始人——周湛	(75)
宋代“千文架阁法”辨析	(78)
“千文架阁法”在近代的应用	(86)

四、古代档案馆

周代档案府及其收藏	(95)
西汉的档案阁与图书阁	(102)
中国档案库建设的传统类型及其启示	(108)
南宋《京城图》上标示国家档案机构的意义	(113)
喜看南宋《京城图》上的国家档案馆	(117)
宋、元、明清架阁库纵览	(123)
浙江历史上的架阁库	(140)
元代地方志中的架阁库	(146)
石室金匮藏秘籍	(149)
古代衙署图上的架阁库说明了什么	(153)
南宋六部架阁库研究	(163)

五、古代档案官员

宋代架阁官名称考究	(173)
宋代架阁官考索	(180)
宋代档案史上的第一大案 ——王永年盗卖官文书案始末	(197)
古代档案官员新证	(201)
陆九渊治荆门何以如神	(209)
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的张苍	(212)
张柔学萧何轻金重档	(214)

六、古代档案思想与制度

宋代档案架阁条法探析	(216)
金耀门文书库及其管理制度	(224)

目录

宋代地方架阁库的设立及其管理制度

- 庆元档案架阁条法再探…………… (233)
- 评宋丞相周必大关于架阁库的两件奏札…………… (240)
- 为治之法,图籍为本
- 宋代韩琦档案思想及其影响…………… (244)
- 宋代有三日归档说…………… (249)
- 喜读清代东乡里县架部阁库记…………… (255)
- 始之所为 若甚迂缓 至其用之 乃世最急
- 宋人档案思想新证…………… (260)
- 《治牍要旨》较早论述档案管理…………… (266)
- 明清时期的封赠制度与诰敕档案浅述…………… (270)
- 中国古代档案两大部类说…………… (277)

七、杂谈

三国吴简

- 古代档案的第五次重大发现…………… (284)
- 中国古代图书档案防虫技术初探…………… (287)
- 寻根谒祖话谱牒…………… (290)
- 谱牒沉浮三波澜…………… (294)
- 谈谱牒档案的价值与开发…………… (299)
- 心系甲骨访殷墟…………… (305)
- 故宫文献馆对明清档案的整理
- 访兰台老人张德泽先生…………… (311)

八、档案史话

- 谈老子“窥藏史”与孔子“听诵诗”…………… (316)
- 许同莘与公牍学…………… (319)

一片甲骨透殷情·····	(326)
民国时期的政府公报·····	(328)
千古仅存的“假禅让”档案·····	(331)
衙本《抚豫宣化录》·····	(333)
幕友邬思道与他的上司·····	(335)
颐中档案里的血和泪·····	(338)
秦桧之虑·····	(341)
尚志文书学校始末·····	(344)
上海档案史的开篇之作 ——读元代《松江府架阁库记》·····	(348)

九、档案教学与交流

中原沃土培新枝

——谈郑大档案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	(353)
档案课教学浅议·····	(357)
在教学中寻找科研课题·····	(360)
在教学中注意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	(364)
走近档案学泰斗吴宝康·····	(368)
谈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	(372)
交流·友谊·合作 ——参加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收获与感想·····	(379)
与我们同行的良师益友·····	(385)
春风春雨催新枝 ——记我与《中国档案》·····	(387)
谈教学与创新 ——从事档案学教学十五年回顾·····	(393)
后记·····	(398)

一、总论

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

中国档案史是一门专业史。开展专业史的研究,挖掘历史遗产,增加学术气息,对提高本专业的社会地位,丰富相应学科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国以来,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建立起中国档案通史的框架,取得可观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现状不容乐观。在档案界,还存在忽视档案史研究的现象。中国档案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甚多,缺憾不少。我们热切盼望档案界同仁放开眼光,振奋锐气,深入探讨,开创中国档案史研究的新局面。

一、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

中国档案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三同志说过:“周总理很重视用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安心做好档案工作。他曾经对档案工作人员说:‘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要他们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①但是,档案界部分学者由于缺乏研究,对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的水平估价过低。早在1986年,吴宝康先生就指出,不能过高估价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同时,也不能过低估价。过低估价的观点集中在4个“没有”上:

(1)中国古代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在封建社会,文书工作和

档案工作是不分的。

(2)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馆,只有档案库。为什么没有档案馆?“因为封建社会不需要它”。

(3)中国古代没有专职的档案工作者。一些类似档案工作的事是由文书人员做的。

(4)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档案学,没有人写过关于管理档案方面的书和文章,更没有著名的档案学家。^②

吴宝康先生不赞成说中国古代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他在给《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中国档案史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只要有确实的材料,他是可以随时准备改变自己观点的。对中国古代档案工作水平的过低估价,严重影响了对中国档案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的错误观点至今还出现在档案史课程的教材中。这是中国档案史研究中存在的第一缺憾。

第二缺憾:方向偏离。既然认为中国古代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具有不可区分的属性,文书工作者同时也是档案工作者,那么,要增加档案史的份量,就必然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和文书工作史的内容塞进档案史的著作中,上至丞相,下至地方官吏,皆可算文书档案工作的管理人员,唐代的韩愈、李白、杜甫等文人也包括其中。我认为这样做是欠妥的。

人所共知,近代档案学产生的首要标志是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将档案工作与文书工作作了明确的区分。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如果偏离了这个研究对象,在所谓“文书档案工作”、“文书档案管理机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文书档案工作法规”等等模糊概念下去扩大档案史研究的范围,那么,在学术研究上就是走回头路,会使档案学的科学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丧失。我们还可以与世界档案史研究对比,世界档案史研究是不包含世界各国的文书名称和文书工作的。

第三缺憾:学术气氛不浓。在档案史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问

题亟待解决,但是,重视者甚少,研究者更少,缺乏一种相互争鸣的气氛。记得这样的事,冯子直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期间,荷兰朋友问他:中国古代档案保留至今者甚少,据说原因是中国人重视档案编纂,不重视原件保存,编完之后,将原件都烧掉了,历史果真如此吗?冯子直撰文,呼吁档案界专家对此认真研究,给予一个正确的解答。此事过去几年了,至今无人应答。连外国人都关注的这样一个中国档案史上存在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沉默不语,漠然视之,这种状况正常吗?

再如,“档案”一词来源问题,可以说是档案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一大问题。它是很早就有的概念,还是到清初才出现的?它的涵义是什么?是来自汉语,还是来自满语?或者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若干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引起档案界的关注还不够。还可举一个例子。近年来,有的学者根据可靠史料,证明宋朝人创立的一种档案管理方法是“千文架阁法”,不是什么“千丈架阁法”,论文受到中国档案学会的奖励,其研究成果写入近年出版的《档案学词典》。但是,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似乎并不知此事,在其刚发表的论文中,仍引用“千丈架阁法”的错误史料。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档案史研究力量的薄弱。

二、深入开展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

在中国档案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之后,要深入一步研究,就必须分历史阶段研究,或按专题进行探讨。以往的研究也这样做过,如研究过档案的起源问题,档案保护技术历史传统问题等等,但是,总的来看,很不系统,不具体。正如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档案史的研究是零碎的,而不是综合的;是空泛的,而不是具体的。要具体地、系统地研究中国档案史的哪些问题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选择

的:

(一)“档案”词源研究

“档案”词源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实践”的问题。在档案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最具有专指性的术语莫过于“档案”一词。我认为,它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很晚才出现的词汇。在“档案”一词出现之前,会有一个在涵义上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存在。目前,可以肯定地说,宋代出现的并被频繁使用的“架阁文字”就是这样的词汇。近年来,我们发现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就使用“文档”一词,^⑤它对研究从“架阁文字”向“档案”一词的过渡至关重要。由此,也使我们对清初《柳边纪略》中的“档子”一词产生新的解释。现在的不足之处是我们还缺乏更多的史料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如果在元、明两代的史料中深入发掘,定会得到更切实的材料,“档案”词源问题的解决将为时不远。

(二)档案职官研究

对此问题的准确把握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反驳“四没有”观点的最锐利的武器。只要有确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古代有档案工作的专职官员,那么,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我和一批青年学生,查阅了大量宋代文献,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管勾架阁文字”,南宋恢复设立的“主管架阁文字”,即通称之为“架阁官”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档案工作官员。我们从古籍中,找到有姓名、籍贯、出身和任职时间的160余位架阁官,他们担负着“姑备朝廷之遗逸,谨防胥吏之漫欺”的重任,有着“白日青春了无公事,黄簾绿幕宛是儒生”的潇洒。^⑥其职责与形象和今日的档案工作者极相似。古代档案工作专职官员的设置及沿革是可以搞清楚的,不必要从文书工作官员队伍中硬拉伙伴。当然,对兼职工作者还是要注意的。

(三)档案馆史研究

什么是档案馆?《档案学词典》解释说:“档案馆,收集保管档案

的机构,任务是接收和征集档案,科学地管理档案,开展档案的利用等。”那么,为什么外国保管档案的机构可以称作“神庙档案馆”、“皇帝档案馆”等,而中国古代保管档案的机构只能称作档案库呢?为什么外国的奴隶主、封建主需要档案馆,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竟然认为“不需要它”呢!显然说不通。

记得本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朋友向他寻问中国档案馆的情况,他一时回答不出。事后想到中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后湖志》,认为它是记载“明代黄册档案馆”的专书,于是,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季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这座500年前的档案馆,说它的“设备和管理,极象一个近代的档案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国历史上的光荣。”^⑧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档案界还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馆呢?厚厚一本明人编修的《后湖志》,就是一本后湖黄册档案馆的馆史,档案界应该仔细阅读,整理出版。从周代的石室金匱,到明清时期的皇史宬,我们应该系统研究,以确立中国档案史在世界档案史上的应有地位。

(四)档案编纂机构研究

重视档案编纂是中国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特色。以往虽注意到从孔子到章学诚的档案编纂思想的研究,但对历代档案编纂机构的设立,周密的管理制度,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丰硕的编纂成果等研究不够。编纂工作完成之后,“焚稿椒园”是惯例,但焚的是草稿,而不是档案原件。以往,史学界和图学馆界都侧重于编纂体例和成果的研究,而忽视编纂机构的研究,档案界应该拾遗补阙,对史馆等机构作一系统总结,为今日处理档案工作与编史修志工作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五)档案法规研究

一个历史时期的档案工作法规是该时期档案工作水平的集中体现。中国档案工作法规有一个从分散出现到系统形成的过程。秦

代竹简中已有关于“书府”防火的条文,唐代文献中有将保存的文书要“三年一拣除”等方面的规定,但仍是分散性条文,并且不是单指档案工作而言的。宋代《庆元条法事类》专列《架阁》一目,集中23条敕令,对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有严格要求,这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是极为罕见的。元、明、清时期情况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华民国时期有关文书和档案工作的法规已有汇编问世,但研究仍待深入。

(六)传统档案管理方法研究

我们对外国档案整理与管理方法、原则的研究越来越多,可是,对祖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管理方法却知之甚少。北宋时期的周湛创立了著名的“千文架阁法”,经朝廷在全国推广,对当时及其以后的档案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人还创立了“别库架阁”、“逐案异架”、“以年月、官司编排收贮”等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元代和明代的文献中,仍可见到将文书“如法架阁”的规定,这就说明,在宋代以后,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普遍使用的档案管理办法,它是亟待发掘的宝贵的历史遗产。据说,清代书吏使用一种“江山一统”的管理方法,情况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个谜。

(七)古代档案学研究

开展中国档案学史的研究似乎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难点在古代,古代有没有档案学?如果肯定说有,那么,它包括哪些内容?有什么样的论文或著作?这是不易回答的。我认为还是先研究一下古人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宋代名相韩琦和韩缜提出的“为治之法,图籍为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认真研究^⑥。古人撰写的档案工作方面的论文也不是没有。南宋人李大异等人撰写的4篇《六部架阁题名记》等,内容相当丰富,杨冬荃同志作了充分的阐释和正确评价。最近,我们又发现宋丞相周必大撰写的《论架阁库文字》、《乞修架阁库》两篇奏札,其中,“先收图籍者贤相之规模,缘绝簿书者奸吏之常态”的论点十分鲜明,非常深刻。可以肯